

宋明理学与 道家哲学

道

家

文

化

研

究

丛

书

陈少峰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天人一氣相呼吸
以法追來煉形質
寂寞玲瓏五蘊空
費光萬道達天碧



煉形法。

主编 汤一介 陈鼓应

宋明理学与 道家哲学

陈少峰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明理学与道家哲学/陈少峰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1
(道家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80646-225-2

I. 宋… II. 陈… III. 理学-关系-道家-哲学-研究 IV. B22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9082 号

责任编辑:李国强

封面设计:官超

宋明理学与道家哲学

陈少峰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875 插页 3 字数 189,000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册

ISBN 7-80646-225-2/B·44

定价:18.00元



作者陈少峰 ▶

道

家

文

化

研

究

总

书

与读者共勉

继往开来

温故知新

陈少峰

▲ 作者陈少峰手迹

道家文化研究丛书

总序

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一样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巨大影响,并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德国哲学家雅斯伯思(Karl Jaspers, 1883—1969)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这些文化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传统,而且这些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只是在后来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才产生了相互之间的影响。这说明老子开创的道家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本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内外对儒家学说的研究比较兴盛,相比之下道家思想的研究不像儒家思想的研究那么红火。但进入九十年代,国内外学术界对道家思想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在国内不仅出版了不定期的丛刊《道家文化研究》,而且召开过多次国际性的“道家文化”的学术讨论会,还出版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专著,推动了道家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总观历史,我们可以说,儒道两家在思想上形成的某种互补格局(当然后来又有佛教的加入,形成了儒、道、释三家在中国历史上合流互动的局面),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说儒家思想的特点表现为一种人文主义精神,那么道家思想的特点则表现为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儒家大体上是从追求个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而发展为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即人类社会的和谐),例如儒家所提倡的“和为贵”、“致中和”等思想就表现了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的追求。道家则是从体认自然的和谐引申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例如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和庄子所说的“太和万物”的思想,都表现了道家“崇尚自然”的特质。因此,对道家思想和对儒家思想的深入研究都是我们应特别重视的。从目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重大课题看,大家都承认是“和平与发展”问题。人类社会要合理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和平共处”,因此就要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要调整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儒家思想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有意义的资源。但今日之世界不仅需要较好的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较好地解决人与自然的(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人类社会才可以“共同发展”,在这方面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无疑可以提供有积极意义的资源。因此,推动道家思想的研究是很有现实的和理论的意义。至于道家思想在哲学形而上理论层面的贡献,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而且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研究道家哲学理论需要以现代眼光给它以新的诠释,使之日日新,贡献于世界。

道教是中国本民族的宗教,它和道家(老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说道教在思想文化上是道家思想宗教化的继承和发挥。道教作为一种宗教不仅对民间有着巨大影响,而且它对中国哲学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例如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等等)都有重要影响。查《道藏》中收入了对《道德真经》(《老子》)的注释五十余种,对《南华真经》(《庄子》)的注释十余种,这些注释都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对老庄思想的发挥。如果我们说,先秦老庄是道家思想的第一期,即创始期;那么魏晋时期的“玄学”则可以被视为道家思想的第二期发展,例如王弼的《老子注》、郭象的《庄子注》都是对老庄思想的新的解释,并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到唐初兴起的“重玄学”,我们可以把它视为道家思想的第三期发展。道家思想的第三期重玄学是继承了魏晋玄学的思想,并吸取了印度佛教发展起来的,而它的建立则是通过对《老子》、《庄子》的注释实现的。唐初重玄学与魏晋玄学相比,它把道家本体论发展为道家心性论,而重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成玄英和李荣都是道教徒,而且以后大多数通过注释《老子》、《庄子》来发挥其思想的大都也是道教徒。这就是说,到隋唐以后,从哲学理论上,前此的道家思想是由其后的道教接着向前推进的。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它必有一超越的终极目标以及如何通过修持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重玄学虽然为此目标建立了以“理”、“性”、“心”、“气”的心性学架构,但它还没有提出一套为实现此目标的修持方法,其后有“内丹心性学”的出现。“内丹心性学”虽是唐末以后一直到宋明道教思想发展的特有形式,但从理论上,它仍然是道家思想宗教化的发展。就这个意义上说,道教的思想理论是和

道家的思想理论分不开的。我们编辑这套“道家文化研究丛书”就是基于这种考虑,把道家 and 道教联系在一起,都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这套“道家文化研究丛书”要求以专著的形式撰写,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撰写和出版能提高道家 and 道教的研究水平。为此,我们组织了全国各地对道家 and 道教有较高研究水平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作为这套书的作者,计划在三至五年内出版四十本有关道家 and 道教的专著,每年出版若干本。这四十本书大体分为四组:道家发展史专题研究,是按照历史时期对道家作思想史的研究;道家思想专题研究,是对道家思想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的研究;道教思想专题研究,是对道教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的研究;道家、道教著作专题研究,选择对道家 and 道教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典籍进行研究。虽然这四十本书每本都是单独的专著,但是把这四十本书作为一个整体看,则又可以看到道家 and 道教的方方面面。

这套“道家文化研究丛书”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书院主持编写的,它能够出版,是得到了台湾凯胜集团董事长黄胜得先生的资助,又得到了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汤一介

1999年7月8日

导 论

本书的主题是揭示并具体分析宋明时期的理学家对道家哲学的吸收与借鉴过程,同时阐述这一思想活动过程对宋明理学发展的影响。

以下渐次说明研究的基本思路及其相关事项。

—

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熟知,宋明理学是中古后期儒家哲学新的综合更生的基本成果。自唐中叶的韩愈、李翱以及宋初的一些学者揭橥复兴儒家宗统的旗帜以后,学者们积极营造新的儒家哲学系统,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动发展,逐渐衍生成学派哲学。新时期的儒家哲学因其方法之同异而具有学派性质;不过,其基本价值观则无不以修身立命的信念为归依,并且在探讨道德性命之理论的同时,特别注重人伦德性的实践。虽然如此,宋明理学家无一不对形上学以及与此相关的哲学概念的论辩发生浓厚的兴趣。这种思想特征的呈现,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儒家自身重视修身平世传统的复兴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也与魏晋以来玄学传统的流衍密切相关。理学家是这两个传统的综合者。可以肯定地说,理学家为儒家

实践性的学说奠定形上学基础的努力,其目的仍然是希望增强士君子们服膺儒家仁义诚敬教导的说服力。这样,理学之基本宗旨虽然本于伦理实践与道德教化,而其学说的时代价值则表现为哲学基础的重新奠定。

这种新哲学的出现,显然自有其重要的传统和时代思想成果依据,易言之,经过道家哲学与佛教哲学的发展,新时期的儒家哲学必须予以批判的考察;同时,经由几个世纪哲学的重要发展,新时期儒家哲学的创新也拥有足够的思想资源以供参考取舍。关于这一点,一些学者已经做出了比较清楚的分析。据他人传述,陈寅恪先生曾如此剖析程朱之学与佛教的关系:“……佛教于性理之学 Metaphysics 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如祀祖、娶妻等。)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椑。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①容肇祖先生说:“说理学的来源,我们可先明白理学是什么?胡适先生解说道,理学挂着儒家的招牌,其实是禅宗道家道教儒教的混合产品。其中有先天太极等等,是道教的分子;又谈心说性,是佛教留下的问题;也信灾异感应,是汉朝儒教的遗迹。但其中的主要观念却是古来

① 《吴宓与陈寅恪》第10—1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道家的自然哲学里的天道观念,又叫做‘天理’观念,故名为道学,又名为理学。(《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胡适文存》三集卷二页一一三)这是一种溯源分析的解说,很是确实的。”^①同样,日本江户时代的儒者室鸠巢也初步提出宋儒对道家哲学的破楔取珠特征:“……惟老子不绝伦理、不外国家、其处世接事物、无与辱异、而所谓全神气尚清静者、吾儒亦有取焉、故程子曰、老子谷神之章最佳、朱子亦注参同契、又往往引老庄之言、以赞道体之妙、惟以吾儒本于性、老子本于气、其所以为言者、有公私之不同、故谓老子为异端、其旨微矣。”^②总之,对于理学与佛教、道家哲学之间的关联,大多数学者认为理学兼采道释之长而弃其与儒家伦理相悖之说,尤其是在形上学方面对于道释义理的吸收,促使新时期的儒家哲学面貌焕然一新。^③

显然,理学家对道释哲学的兴趣与吸收,既有客观的情境使然,也包含主观的积极意识。就客观方面而言,理学家对于流行哲学和宗教学说不能置若罔闻,尤其是对于几乎被普遍认为学说高妙的道释义理的了解,显然必须加以认真的对待;对于他们复兴儒家学说而言,也是知彼以胜彼所必要。同时,

① 《明代思想史》第3页。台湾开明书店,1962年版。

② 日本思想大系34《贝原益轩 室鸠巢》,《室鸠巢书简》四《室直清议神道书》。荒木见悟、井上忠编,岩波书店刊行,1970年版。

③ 这方面的论述,非常普遍。如“从老庄、佛教中吸取浑然之境的超越面,是宋明学者之常事。”(木南卓一:《王阳明的思想》(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5,73年)又如钱穆先生说,“北宋儒学崛起,儒术复兴,理学家长处在能入虎穴得虎子,兼采道释有关宇宙人生原则方面,还本儒学,加以吸收或扬弃,遂使孔子思想崭然以一新面貌新精神,超然卓出于道释两家之上,而又获一新综合。”(《孔子与论语》第176页。联经出版社,1965年版)不过,钱穆先生这里所说的“超然卓出于道释两家之上”的评断,仍有深研探讨的必要。

理学家大多聚徒讲学,弟子们常常受到道释义理的濡染,其中一些弟子经常就道释义理问题询教于师者,不能不粗通道释学说。然而,经过入于老佛几十年的濡染,这些理学大宗师们或者对道释之学的一些内容自觉地表示赞赏,以儒家经典中的义理附会之;或者甚至接受了其哲学思维方式而不自知。此外,理学家希望使儒家哲学具有形上学的基础,不能不综合所有思想资源以充实并支持自身的哲学创新。就主观方面来看,理学家既不能免于流行学说,或者欣然向往之;或者希望自己能够深入其中而凌驾之;终于都自觉地研究道释之学几十年,最后虽然都返归儒家的价值观,而莫不破其桷取其珠。他们的哲学活动与道释相关之基本情势与动向大约如此。

二

理学的兴起,在其动机上既求复兴儒家哲学以重振教化天下的学术力量,同时也寓含着对抗当时风行的佛老之学的意识自觉。在这一目标自觉和学术努力的过程中,理学家内部的意见大体并无对立之处,但他们的哲学方法则同中有异,甚或大殊其趋。要约其归,理学的出发点和讨论基本哲学问题时所表现的特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针对当时风行的形而上学之浓厚兴趣,寻找出儒家经典中富于形上特征的部分加以新的阐释,以逐渐完成其被称为所谓的“道学”来对抗佛老学说。朱熹的《四书集注》具有代表性。其二,在形成的理学中,由于其中包含着形上学的许多极富于抽象的要素,在其强调佛老归虚、“吾学”虚实合一的说明中,面临着如何将虚的要素保存其形上的韵味,同时又能够通过修

养来把握和体现。这就是为什么语录体盛行,既以通达易懂的语言表达修养论,而同时又那么富于玄学气息、那么难于直接把握之故。正是在这一方面,理学家几乎人各立说,包括将传统的各种概念范畴如有无、动静、体用、先后、心性、性情、理欲、虚实、无极太极、已发未发、本末、一多等等尽其所能地加以发挥,形成欲实而蹈虚、欲主一而杂多纷呈的气象。其三,基于前二者的解说,理学家之间针对圣学之解释和修养方法之妥当性展开了论辩,由此展现出学派的立场与方法的模糊线索。

考察理学家的思想活动,其中既可以看到他们在出发点上对佛学、老庄学以及道教的对抗情结,也可以看出他们思想展开过程中对前者的吸收特征。由于这一对抗的前提首先是在形上学方面的对抗,故其着重点是维护圣学在形上学方面的权威。而这一点,是以理解佛老的理论体系为基础和前提的。他们试图使自己所构建的形上学体系既能够包容佛老哲学中的形上学趣味和方法,同时又求超越,希望达于虚实相贯、有无相即、体用本末融通无碍的圆满性,于是便诉诸于对儒家经典的新阐释,“言圣人所未言”,以及直接批评佛学道家二者的“不见道”。而在对儒家经典的新阐释中所体现的“新”的因素,以及言圣人所未言而又合于道的立说方面,都大量地吸收借鉴了佛学及道家哲学的概念、体系结构和方法论的内容。同时,在运用其新构的学说批评佛学和道家哲学的同时,一方面确实指出了佛学及道家哲学尤其是佛学中方法之间的内在矛盾,例如指出佛学中“无执”与逃避伦常实际行为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时常运用道家哲学的方法来批评佛教,如以道家玄学的“自然”之方法来批评佛教之

逃匿人伦自然。或者以佛教的圆融观来批评道家哲学的“有无”、“内外”的分离说。^①

在宋代社会走向繁盛至于清初的历史进程中,士大夫对形上学的兴趣始终十分浓厚,也正是在这一形势下,佛教与道家道教的衍生延续力不绝如缕。朝野上下对形上学的兴趣在北宋以及明末时达至高峰,其间经由理学家在朝的学说推广而逐渐波荡为社会意识形态,在制度上经由科举,在社会活动上经由书院、会讲、著述、宣传(包括蒙学)而深渗于社会各个思想活动、教育、观念传播领域。在这一活动中,重新复活了清议与清谈的风气,并转而提升了知识教育界和宗教界对形上学的兴趣。理学与佛教、道家道教之间的关系转而模糊,并在三教互荡互动的形式下完成了中国哲学的新的阶段性体系和特质。从客观的分析来看,则是理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与当时佛教、道家道教的性质状态密切相关,包括与理学建立的形上学体系之活力状态相关甚密。易言之,每一个理学家几乎都没有被儒家经典的形上学自身的魅力所吸引,而且都对已经完成的理学理论体系不满意,几乎都在出入于佛老之后才重新回归儒家,而且是在已经取“珠”之后,才来说明“吾儒所固有”。不仅那些风动一世的理学家如此,就其严格辨别异端正统之后,其弟子们仍然耽于佛学、老庄的本体说方法论或者是道教性命双修之理。正是理学家们对佛学、老庄、道教

① 事实上,道家经由玄学的发展已经抛弃了分离说,不仅深刻地影响佛学,而且被理学家所吸收。例如,程颢在批评庄子游方之外和游方之内时,所用的根据正是向秀、郭象《庄子注》中的“游外以弘内”之说。同时,他在批评张载主张定于内之学说是错误的时候所用的方法也是《庄子注》中的“无心以顺有”、“寄之于理”以及王弼“情顺万物而无情”等说。

的浓厚兴趣自身,推动了佛教、道家道教学说之波荡。从哲学史而不是一般的思想史加以研究的话,理学与佛学、道家道教之间的关系乃是第二次玄学思潮中的内部展开,而其中方法论的异同以及相互激励,构成理学哲学史研究的根本课题。

三

宋明理学哲学基础的结构与方法,无疑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题。近代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此加以重视,并开疆辟土,逐渐拓垦出一片沃野。或揭明其大纲、理顺其脉络;或深入其渊源演变,传述其精神所自。研究既重,成果也蔚为大观。不过,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果,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成果是不可超越的,毋宁说,这些成果为新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迫切需要研究的深入与提高。理学的整体研究的新进展,必须是在专门领域的深入把握之后,集专门研究之大成,而目前在专题研究方面的不足,对于理学的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是个缺失的支柱。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理学与道家哲学之间的关系,无疑构成了宋明理学专题研究的重要方面。

当然,到目前为止,专题研究已经取得重要成果。例如,揭示某个理学家及其学派的思想源流、比较其哲学方法,探讨分析理学与道家道教和佛学吸取借鉴、互动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仍在富于成效的展开过程中。但综合而论,仍然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许多综合性研究并没有吸收专题研究的成果。例如,综观宋明理学整体研究著作和通论性著述,最明显的不足是对理学源流揭示的匮乏。尽管许多单篇论文已经针对某

一理学家思想源流进行深入探讨,可惜其成果尚未被概论性研究所吸收。另一方面,尽管目前的专题性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考察理学与佛学、理学与道家道教关系的研究著述也日见深广,但有些专题研究也未重视其他的专题研究成果。例如,有些学者研究深受佛教道家哲学影响的哲学家时无视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仍然在儒家传统的内在圆融性上打转;许多专题研究也尚未系统化,更没有形成不同视角研究结果的相互激荡。例如,理学与道家道教关系方面的研究就极显不足。当然,从研究的趋势上看,对于宋明理学的某个专题的研究必将取得新的进展。

关于理学与佛老关系之问题,当时的许多学者已经议论纷呈。就研究而论,清代学者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对于理学的批评其实已经包含重要的研究成果。虽然许多学者可能提出,戴震对理学的批评包含个人的哲学观点,甚至有其预设的态度;然而,戴震对于理学家的态度显然较儒家津津乐道的孟子斥杨墨的态度远为宽容;而且,他的批评显然基于深入的研究,故常有精锐之见,如分析周敦颐与老庄哲学的关系时说:“自老氏贵于‘抱一’,贵于‘无欲’,庄周书则曰:‘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周子《通书》曰:‘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请问焉。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哉!’此即老、庄、释氏之说。”^①他的立论并非基于主观好

① 《孟子字义疏证》第9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恶。事实上,戴震对理学的批评可以视为一个辨明理学思想源流的专题研究。

关于理学的思想渊源及其流衍过程中与佛教和道家哲学的关系,阐述理学与佛教关系的研究较澄述理学与道家哲学关系的研究成果显著。研究理学与佛教关系方面的专著已经相继诞生。例如,日本学者久须本文雄所著《宋代儒学的禅思想研究》^①,荒木见悟所著《佛教与儒教》^②等都是代表性的著作,尤其是后者在哲学史专题研究的方法方面更具影响力。国内侯外庐、邱汉生等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也特别注重宋明理学与佛教义理学说之间的关系。^③而理学与道家哲学、道教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概论性研究中的提示或者概括,如钱穆先生、陈钟凡先生等学者都有阐述。其二是对理学思想渊源方面更具体些的研究,如蒙文通先生、刘师培先生以及冯达文先生等人的研究。其三是一些专题论文的阐述,如柳存仁先生、秦家懿先生以及许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专文等。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活跃,主要体现在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所发表的许多论文上。不过,虽然研究的进展十分引人注目,而且成果也很突出,但尚未有对这一专题进行整体的资料整理并撰述概观性把握的著作。而这正是本书尝试完成的研究课题。

① 日进堂书店,昭和五十五年五月出版。日本学者的研究,有其佛教学术发达以及传统研究积累的背景。在日本江户时代,就有很多儒学者分析宋儒与佛教的关系,认为宋儒受佛教影响甚深。比较激烈的说法如阳明学的学者太宰春台认为“宋儒之道,效佛者十八九,效老者十一二”(《春台先生读损轩先生〈大疑录〉》,见《贝原益轩 室鸠巢》)。

② 研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荒木先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佛学背景,当注意。另外,在该书中,荒木先生从理学中的基本概念“性”出发进行研究,本书将在文中对其合理性加以探讨。

③ 《宋明理学史》上下卷,人民出版社,分别为1984年、1987年版。